

再论《全清诗》编纂的重要性与可行性

罗时进¹

(苏州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苏州 215123)

【摘要】: 一代有一代之诗, 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晶和标格。总汇历代诗歌作品, 已形成学术传统, 取得了可观成果。到目前为止, 断代性诗歌总集唯有《全清诗》编纂尚未进入议程。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朝的诗歌创作, 清诗是诗史的大总结, 不仅诗人众多、诗篇海量, 其书写内容也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。《全清诗》编纂, 将使中国历代诗歌全集合璧无缺, 使中国诗歌史宝库得到极大的丰富, 对表征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, 增进国家诗文化软实力, 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建设,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虽然开展《全清诗》编纂工作极为不易, 但完全可以全面统筹、科学规划, 采用十朝清诗“分段法”有序进行。相信只要坚持不休不止, 前后相续, 则磊石成山, 藏事可望。

【关键词】: 《全清诗》 编纂 可行性 分段法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 2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001-4403(2021)02-0138-10

一代有一代之诗, 这是一代文学的结晶, 也是一代文学的标格。总汇历代诗歌作品, 已形成学术传统, 取得了可观的成果。中国古代诗歌到目前为止, 已经有了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诗》《全元诗》《全金诗》等。其中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的增订工作已经开始, 《全唐诗》进入到增修、重编阶段, 而《全辽金诗》的出版, 增补了辽诗之缺。《全明诗》编纂虽较为迟缓, 近三十年来也取得了具体成果。迄今断代性诗歌总集唯有《全清诗》尚未进入议程, 中国历代诗歌“全集”的整理缺少了一个重要部分, 无法配套成龙。而这一部分, 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大总结, 不仅诗人众多、诗篇海量, 其书写内容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, 《全清诗》编纂工作亟待进入古籍整理工作的议程。

一、《全清诗》编纂: 一个世纪的呼吁与初步实践

清代帝王将以往断代性诗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纂辑、完整呈现, 始于康熙年间钦修《全唐诗》, 其后有康熙御订《全金诗》、嘉庆年间钦编《全唐文》问世。《全金诗》系郭元钊个人增补《中州集》(故称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), 影响并不大, 而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不但形成了重要的文化标志, 也积累了分体断代文学作品编纂的经验。这种标志与经验, 对晚清士人具有激励和启示意义。最早编纂《全清诗》之议, 显然受其影响。

此事应回溯到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十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《东方杂志》刊登了一篇《征求诗文集启》: “本朝开国已二百余年, 文风之盛, 远轶前代。本馆拟仿《全唐文》《全唐诗》之例, 纂辑国朝诗文。惟是见闻有限, 加以近人专集刻本无多, 访求不易, 用特敬告海内著作家、藏书家, 如有前人及生存人之诗文, 无论刻本、稿本, 祈挂号寄交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。收到后, 按月将目录登载《东方杂志》, 以志谢忱。如系不易购求之刻本, 乞示明价目, 本馆或备价寄奉, 或从速钞录, 仍将原书挂号寄还。其未刻之稿本, 无论全集、零篇, 亦希寄示; 如无副本, 钞录后仍即挂号寄还, 想亦大雅君子之所许也。再, 寄书时, 能将著者生平大略见示, 尤为厚幸。”^[1] 此时主持商务印书馆事务者为张元济。由此可知 110 年前清朝末期, 学界已有编纂一代诗文之愿。当时清王朝的历史尚未终结, 其所编本质上自然不是《全清诗》, 但“拟仿《全

¹作者简介: 罗时进(1956-), 男, 江苏东台人,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 18ZDA255)的阶段性成果

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之例，纂辑国朝诗文”，内在指向与《全清诗》并无二致。当时文献学家胡玉缙看到这篇《征求诗文集启》，不久发表《与张菊生元济论纂辑〈全清诗〉〈文〉书》^{[2]483-484}，从题目可知，他是完全理解商务印书馆及其张元济的宏愿的。

此后南社高旭倡编《三十年诗征》，有编纂《近代诗》之意，“其友人胡怀琛闻之，寓书以辑《全清诗》相勉”^[3]。胡怀琛在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》中还提及“黄岩王葆楨，亦剑公旧友也，昨岁与余遇于沪上，颇有意于《全清诗》事。又闻同社景耀月，欲作《清诗存》”。此事发生于民国三年(1914)至五年(1916)间。朱则杰先生认为，这里的“全清诗”是“全清诗选”之意^[4]，此说正确。但南社人的倡议和讨论无疑将《全清诗》编纂问题进一步置于学界视野中，成为引人瞩目的议题；同时“欲作《清诗存》”的设想，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，对后来清诗编纂实践具有启示意义。

1919年春徐世昌倡立晚晴簃诗社，这是《全清诗》编纂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。诗社设在总统府集灵囿的晚晴簃中，“(世昌)从政之暇，评量风月，饮酒赋诗。一般遗老趋之若鹜，而新华宫内晚晴簃诗社遂应运而生”。“于是媚徐者进言曰：‘兹值开国之初，尧舜在位，宜将全清诗铨选合刊成一代巨制，如前清钦定《全唐诗》，向称一朝盛典。今既有晚晴簃之社名，公卿硕彦鸿儒咸萃于此，苟能建此鸿业，不仅足为诗学前途无穷之利，而晚晴簃之盛名亦昭垂千古矣。’”^{[5]23}汪中回顾“晚晴簃诗社”时说：“当时有人提议，前清钦定全唐诗文，是一朝盛事，现在民国，宜将前清诗文，加以整理，以成一代巨制。”^{[6]439}细绎这两条史料，对“全清诗”有“铨选”与“整理”之别，但“以成一代巨制”的提法是一致的，这应是晚晴簃诗社的宗旨所在。这一宏谋最终在徐世昌手上实现了。他倾其门人幕客之力，于民国十八年(1929)编成了《清诗汇》(即《晚晴簃诗汇》)。¹全书200卷，入选诗人6168人，得诗27000余首。虽然这个清诗总集所收之量，其人不足清代诗人的十分之一，诗篇不足清诗的百分之一，但迄今为止，仍然是规模最大的清诗总集。

《晚晴簃诗汇》面世后，引起广泛关注，褒贬之声间出。金梁有续补之作，题为《清诗补》，分上、下两卷；陈融则拟别纂一部清诗总集，以存目的形式连载在《青鹤》等杂志上，凡录250家之诗。^[7]1933年陈衍《近代诗钞》出版，收录诗人370家。陈衍称“是钞时代断自咸丰初年生存之人，为鄙人所及见者”(《凡例》)，其中有部分为《晚晴簃诗汇》所未及收。1929年叶恭綽开始编纂《全清词钞》，20多年后方基本完成。其初选得4000余家，最后录词家3196人；词作8260余首。这是与《诗汇》形成双轨的重要工作，虽然都止于“汇”“钞”阶段，但后来《全清词》编纂工程得以启动，而《全清诗》则始终处于呼吁、筹划过程，未能得到相关层面的立项支持，展开实质性工作。

1980年郭绍虞先生曾呼吁：趁现在这个时机，赶快组织力量编辑《全清诗》等，以保存一代的文献。^[8]钱仲联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《自传》中也表示：“曾有编纂《全清诗》的愿望，限于种种条件，力不从心。”^{[9]25}严迪昌先生在《清诗史》中表达出对此的焦虑：“(清代诗歌)迄今尚无一部编辑整合的总集，……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、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，由于陌生伴随缺陷俱来，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。”^{[10]1}1993年10月，朱则杰先生在浙江大学筹建了“《全清诗》编纂筹备委员会”，发表了《〈全清诗〉的先声》《论〈全清诗〉编纂的迫切性与可行性》《论〈全清诗〉的体例与规模》《论〈全清诗〉分“编”法设计》《论机读〈全清诗〉的编纂》《全清诗集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使用》等论文²，并深入进行清诗文献的考证，出版了相关专著。朱则杰堪称1980年代以来在《全清诗》编纂问题研究方面最具成就的学者。尽管因客观原因，这项工作未能如愿，但其一系列探讨，接续前人，将《全清诗》编纂工作再度放到学术层面，能够促使学者作进一步思考。其后，罗时进发表《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》^[11]、赵宝靖与冷卫国发表《编纂〈全清诗〉的一种可能性思路》^[12]，一定程度上都受其启发和影响。

从张元济发布《征求诗文集启》，提出汇编有清一代诗歌作品以成《全清诗》鸿制，至今已逾一个世纪。百余年来，从倡导、呼吁，走向初步实践，拟议中的设想逐渐化为一个宏大的清诗文献整理蓝图，并成为学界的一种深刻期待。斯事愈艰，而期待愈深。

二、《全清诗》编纂的迫切性与可行条件

中国古代诗歌理应得到全面总结和完整呈现，不能有头无尾，《全清诗》编纂的重大意义应该提到全面总结古代诗歌、完整展现中华诗歌传统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、增强文化体认与自信的高度来认识。

从学科发展需要和文献收藏实际两个角度而言，《全清诗》的编纂具有迫切性。近三十年间，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。如果说此前清诗未受重视，研究队伍零落，研究面向较窄，研究成果较少的话，近些年发生了重要转变，学者们一方面遵循“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”的规律，由源望流，力图理解自先秦以来形成的诗歌传统，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一朝形成了何种面貌，其意义何在；一方面“望今制奇，参古定法”，在研究现当代诗歌（乃至整个文学）发展时，往往向上追溯，将清代诗坛作为一个重要参照。当然，由于清诗较之前代诗史，创作现象丰富，承流新变突出，开拓余地较大，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。因此与以往相比，清代诗歌研究已经形成了新气象、新格局，不仅研究队伍趋于整齐，研究面向不断拓展，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。

但这并不能说明清诗研究水平已经可以比肩前代。应该承认，现有的清诗文献可以勾勒出一代诗歌发展的大致脉络，却难以从具体的细节中发现诗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、诗人的交游网络、诗人的文本形成与嬗变。事实上，对清诗发展裁割褻积的了解影响了研究的深入。一代清诗到底具有怎样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，成就如何，其优弊应如何辩证分析，我们的认识并不清楚，主要观点多建立在已知作家的创作以及以往历代诗史的比较上。欲变同质化推演为特质化探讨，变鲁莽灭裂而为实备精求，有待于通观并理解全清诗人、全清诗作的基本面貌。客观来看，依照学术研究的整体环境和发展趋势，在可以预见的并不很长的时间内，民国时期旧体诗歌作品将会得到全面的集成性编纂，如此作为其“上游”的《全清诗》的编纂就尤其应该进入过程了。

从清诗文献的收藏情况来看，也并不乐观。清诗文献，无论总集或别集，主要为各级各类图书馆收藏。这些海量的文献，绝大部分都不会被定为善本而得到特别的保护。一些文本长期无人接触，尘封蠹蚀，日渐渐灭。戴逸先生在《谈清代的典籍文献》时说：“这些珍贵的纸质文献，脆薄易裂，经过虫蚀、火焚、水淋、霉变，都可能毁于一旦，故而特别应该重视。”^[13]²⁴⁸清诗文献在长期馆藏中已有严重残损，如果再不加以搜集、整理、汇集、出版，多年之后的情景难以想象。存世作品的湮灭之虞始终存在，果然如此的话，以后清代之诗想“全”已绝无可能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编纂《全清诗》，是对一笔极为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保护，甚至具有一定的抢救意义。除图书馆馆藏之外，还有一部分清诗集尚在民间。当年张元济立意编纂《全清诗》，在媒体公开刊发《征求诗文集启》；徐世昌着手编纂《晚晴簃诗汇》，通过行政渠道发布《征求清代诗集启》，皆意在广征民间家藏版本。春秋代序，时光周流，今日民间清诗藏本已大为减少，但仍然会有相当数量。如果不抓紧采取适当措施征集，多年后希冀得之，恐将极为困难。

那么，现今开展这项工作是否可行？近30年前，朱则杰先生倡议编纂《全清诗》时，认为“条件日趋成熟”。相比较而言，今天无论从对清代诗人的了解、对清代诗集的掌握，以及可以从事编纂工作的人力资源方面来说，都有了更为成熟的条件。

先谈清代诗歌作者问题。将清代有诗歌作品遗存的作家梳理清楚，是编纂《全清诗》的首要环节。笔者与其他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，清代诗人数量有十万之众。但要落实起来，历数一代诗人，并清楚地记录他们的生卒年代（或生活时代）、字号、籍里、科第、仕履、交游、著述、封赠、时人评价，并非易事。然而，近些年随着清诗研究的逐渐展开，产生了许多相关成果，我们对“清代诗人”的了解已有拓展，而且产生了不少由一个“点”带出一个诗人群体之“面”的成果。清代地域、家族、社群、雅集等研究，对“清代诗人”及其“关系”的发现，贡献尤为卓著。

清代诗人唱和联吟群体规模之大，远远超出一般想象。嘉兴府所辖平湖一地，清代文人结社就有40多个，活动于道光年间鸳鸯湖畔的鸳水联吟社有社集《鸳水联吟集》行世，考其联吟者有173名，清末南社成员更达千余人。³再以嘉道时期一位几乎被文学史家遗忘了的诗人唐金鉴来说，其“少读书罗浮山寺，性耽山水，有烟霞泉石之癖。暇则缒幽凿险，啸傲其间。凡罗浮名胜皆有题咏。又剪荆荆棘，手辟罗汉洞，外列十景，自为序记，并各纪以诗，一时名流和者甚众”^[14]卷三。所谓“一时名流和者甚众”，在今存唐金鉴辑《罗汉洞唱和诗册》中有充分证明。该《诗册》在辑存本人罗汉洞诗之后“附列词人姓氏”，将唱

和者一一俱录，有邱滋畚、凌昞谷、刘三山、鲍逸卿、张仙、何介峰、刘朴石、谢坡山、冯子良、李雪庵、徐梦秋、潘柳塘、秦菊农、缪莲仙、谢渔璜、朱闲泉、赵巢阿、李寿石、黄炯南、谭非石、杨秋舫、陈晋山、陈紫垣、季紫岩、黄炳禹、洗雪门、黎曜垣、李秋畦、陈襄臣、李东桥、李朗川、陈天闲、陈朴山、黄蓉石、唐颖峰、张仙山、陈金溪等，凡 126 家，其中方外诗人 4 家。《诗册》在录各家诗作前，列其籍贯、姓氏、字号，虽然极简，已属可贵。又，清人雅好绘图征诗，持图请题，应者往往少则十数人，多则数十人，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。

清代市镇基层诗人十分活跃，市镇诗歌总集编纂数量也极可观。根据学者研究，仅江南地区清代市镇级地方诗总集就有四、五十种。少数总集收录不足百家，如《桂村诗钞》收录 69 家，《支溪诗录》收录 90 家。但多数总集收录诗人为一二百家，更多者近五百家。如《木渎诗存》收录 150 多家，《竹里诗萃》收录 180 多家，《唐墅诗存》收录 293 家，《梅里诗辑》收录 334 家，《浔溪诗征》收录 340 多家，《平望诗拾》收录 365 家，《盛湖诗萃》及《续编》收录 400 多家，《国朝三槎风雅》收录 471 家。其中虽不乏较知名者，然居于主流诗潮之外者颇夥，诸多单门处士与蠹稿鼠篇，亦赖以存世，可谓相当珍贵。这类清代市镇诗歌总集，对发现、排比清代诗人及其作品、撰写其小传，极有裨益。⁴

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松村昂教授曾根据 131 种清诗总集整理出 42200 家清诗作者⁵，在今天的文献资源条件下，将数约 10 万的清诗作者梳理出来，是可望可即的。依照笔者近二十年研究清代诗歌的经验，尤其基于正在编纂《清代才子传笺证》（按，此为《明清才子传笺证》之清代部分）的体会，清代诗人的生平史料，三分之一充分或较为丰富；三分之一不够丰富，但尚属可考；三分之一比较缺乏，需花大功夫钩沉发覆，其中难免有一部分可能失考。即使如此，清代可以考订生平或考述行迹的诗人之数，也将超过清代以前历代诗人的总和了。

接着谈清代诗歌文献问题。清代文献史料汗牛充栋，文学文献亦浩瀚无际，其中清诗文献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。清诗文献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，其中清人创作的诗歌作品是《全清诗》的本体。目前本体部分的收集、整理条件，已在很大程度上优于三十年前。

首先，四库系列的大型丛书（主要指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等）出版，以及《历代地方诗文集总集汇编》⁶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《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》《清诗总集丛刊》《近代诗文集汇编》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》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》《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》《清代东北流人诗文集集成》《八旗文献集成》等出版，使得大量的清诗文本得以面世。各地一系列大型丛书如《京津冀畿辅文献丛刊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《江苏文库》《浙江文献集成》《豫章丛书》《云南丛书》《巴蜀全书》《福建文献汇编》等，以影印或整理不同形式出版（或正在出版过程中），其中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清代诗歌总集、别集。另如《四明丛书》《金华丛书》《扬州文库》《苏州文献丛书》《无锡文库》乃至县级的《常熟文库》之类，其中的清诗文献都有阐幽发潜之功。地方志在我国古籍出版工作中成就显著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收录 3000 余种方志，已属皇皇大观，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》（及《续编》）、《著名图书馆藏方志丛刊》等一系列珍稀方志的出版，对清诗辑佚、清代诗人考索，亦有重要作用。

其次，清诗文集的目录版本学研究，有极大推进。这一方面得益于历时十七年完成的《中国古籍总目》（傅璇琮、杨牧之主编）的巨大成果，得益于《清人著述总目》（杜泽逊主持项目）的完成；同时也得益于《清人别集总目》（李灵年、杨忠主编）著录近 20000 家约 40000 部诗文集，以及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（柯愈春著）著录 19700 余家 40000 余种别集。清代江南为文渊藪、文学重镇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发布征书谕令，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，江苏进书最多，苏州书局、江宁书局和两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 30 次，实际进呈总数达 4808 部。其次是浙江，陆续奏进书目清单 14 次，进呈总数为 4600 部。^{[15]35}《全清诗》编纂，江浙仍将是重点收录地区，相关目录学研究十分重要。已出版的《江苏地方文献书目》（江庆柏主编）收录图书 6000 余种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清代江苏诗人编纂的总集、别集；而《清代浙江集部总目》（徐永明主编）著录有清一代浙籍人士或非浙籍人士关于浙江的现存著述，共计 4600 余人，11000 余种著作。其中别集类 8035 种，总集类 1220 余种，诗文评著作 126 种，此三类著述皆极有助于《全清诗》的编纂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《清代家集叙录》（徐雁平编著）的出版，是近年来极具特色的断代专题类版本目录学研究成果，共著录清代家集 1244 种。清人家集，实多为诗文集，其中往往又以诗集为多；诗集之中，尤以

清代比重最大。如《程氏所见诗抄》(安徽休宁等地)清前历代共录 301 人,清代则有 349 人(含闺秀 23 人);《携李庄氏诗存》(浙江嘉兴)清朝前代所录诗人仅 3 人,清代则有 26 人。该书除著录修撰者、版本、卷数、馆藏等信息外,还采录了序、跋以及家族碑志文等史料,极便利用。在现代信息条件下,尤其是大数据理念和技术的推进,不仅国内馆藏清诗版本的情况较易掌握,对海外相关馆藏信息的了解,也有较为便捷的渠道,这是多年前可想而不可及的。⁷

清代诗人事迹和文本考证引起很多学者关注,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。钱仲联先生的《清诗纪事》奠定了基础;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之《清代卷》(钱仲联主编)及《近代卷》(梁淑安主编)梳理了大量作家的生平;江庆柏先生的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利用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、相关传记、齿录、年谱等考证了约 25000 名清人生卒年;朱则杰先生的《清诗考证》《清诗考证续编》解决了不少清人生平和清诗文本问题。另外,几个相关重大项目的开展,如《清代文人事迹编年》(蒋寅主持)、《清代诗人别集丛刊》(杜桂萍主持)、《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》(罗时进主持)、《全清诗歌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》(王卓华主持)、《明清才子传笺证》(罗时进主持)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。在这一过程中,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研究阵容。可以说,今天专门或参与研究清人、清代诗史,比较熟悉清诗文本的学者队伍,已蔚然可观。

三、《全清诗》的规模与编纂理路

清诗遗存大概有多少?这一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《全清诗》规模的理解,也关系到编纂《全清诗》的理路与方法的确立。

根据已有的断代诗歌整理情况可知,清代以前尚存的诗歌作品,应在 100 万首左右。而诗歌存世数量与朝代演进成正比递升:唐诗乃先唐时代遗存诗歌作品的三倍以上,宋诗为唐代存世诗的五倍以上,明诗则是唐代的十倍之多。时间客观上成为决定文学作品遗存的机制,时间之流中的种种事件——包括人为选择后的筛选、自然环境变化或社会冲突中的毁损、度藏过程中的蠹蚀等——使得距今越远的朝代所遗存作品越少。当然,不能否认各个朝代诗人基数不同,原生作品本来就有数量上的差别;而越向近世发展,诗人基数越大。另外,印刷业发达,诗歌传播越易,受众面越广,文本收藏者越多,保存的概率就更高。清代不但离我们时间较近,而且本身诗歌作者数量巨大,其时印刷出版水平亦非以往朝代可比,因此清诗遗存远超历代是必然的。据测算,应达到 800 万首至 1000 万首。⁸

哪怕再保守的估算,“《全清诗》的数量也将远远超过清以前历朝诗歌的总和,甚至是其若干倍”。朱则杰先生以 1000 册设想《全清诗》的规模,认为“如每册以 50 万字计算,《全清诗》总字数当在 5 亿以上,因此作为一部单一独立的典籍,它的规模比我国历史上最大而现已失传的《永乐大典》(约计 3.7 亿字)也还要大许多,比现存最大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约计 1.6 亿字)则更要大数倍;纵然将从书并计在内,那也只有一套《四库全书》约略可以相当”^{[16]16-17}。笔者完全赞成这一看法。

问题是,对诗家约 10 万之众,作品或达 1000 万之多,字数以 5 亿以上计的超大规模的《全清诗》,当如何编纂?晚清人称“《全清诗》之宏议,伟则伟矣,奈收拾颇不易”^{[17]538}。这个困难至今仍在,提起《全清诗》编纂,便会产生无法着手、难以藏事的无穷压力。到底应该怎样破局?不妨先来看一下学者已经提出的两种方法。

一个世纪以前,胡玉缙《与张菊生元济论纂辑〈全清诗〉〈文〉书》提出:“当时纂辑《全唐诗》《文》各有蓝本,此次……诗当以《国朝练音集》(王辅铭编)、《皇清诗选》(孙鋐编)、《国雅集》(陈允衡编)、《感旧集》(王士禛编)、《湖海诗传》(王昶编)。(其王士禛《十子诗选》、吴伟业《太仓十子》、宋荦《江左十五子》、阮元《两浙 8 轩录》等,亦当及之)为蓝本,再益以其他各集,并诸人之所未及见者,如此比较扼要,而亦易于藏功。”^{[18]483-484}这是一种“据蓝本纂辑法”,今天看来断不可取。实际上,《全唐诗》编纂是以钱谦益、季振宜递辑本《全唐诗》七百一十七卷和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一千零三十三卷的成果为基础的,如果没有这一良好的文献整理基础,彭定求等扬州诗局编臣,决不可能以一年多时间即藏其功。《全唐诗》之“蓝本”性质与胡玉缙所述“蓝本”迥然不同,如按照胡氏的方法编纂,称《清诗存》可,称《清诗海》未必不可,但断不可称《全清诗》。须知“所未及见者”之清诗集实为海量,这个文献空间似非胡氏当时所能估计。想必张元济刊出《征求诗文集启》欲编《全清诗》的初衷与胡氏并不相同,故似未见回应。但胡氏建议中提示要充分重视已有清代诗歌总集的作用,并要特别注意“诸人之

所未及见者”，无疑是正确的。

朱则杰先生经过深思熟虑，曾提出与“据蓝本纂辑法”不同的“分编法”。所谓分编法，即在全书的整体设计上，打破传统的框架，“将总数以千册计的《全清诗》取百册为单位分为若干编，每编内部尽可能严格地按照作者的时序排列，编与编之间则互不连属，各为起讫，成熟一编出一编，一编编累积最后达到‘全’。这样处理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《全清诗》的编纂化大为小、化难为易，能够早出成果，快出成果，工作与效益两不误，从而真正做到切实可行”^{[16]17-19}。他认为，“分编法”有便于操作、便于及时吸收现有成果、便于安排人力、便于资料取用、有利于社会赞助的争取与安排。笔者理解“分编法”主旨思路，亦认为其中包含了现实性考虑，具有建设性意义。但“分编法”也不免带来整体性、系统性、科学性不足的问题。“互不连属，各为起讫”，是一把双刃剑，虽然易于推进其事，但一旦失去文献的统属性，则难免打破诗歌发展史的时间轴线，一代诗人、一代诗歌的呈现容易碎片化；且不免出现诗人小传要根据陆续发现的材料不断修订完善；收录诗歌作品先后复查，前缀后补；无别集流传的作者编排失序；全书索引难以统编的情况，对编辑、阅读和研究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。“成熟一编出一编”，也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，一是很难把握“成熟”的程度，二是如果一编之内作者时间跨度过大，未免有“一编”就是一部《清诗纪》《清诗存》的感觉。“分编法”可以形成《全清诗》编纂的阶段性成果，但无法形成系统性的《全清诗》完帙。

笔者的意见，应该回归大型断代性文学总集的传统编纂方法，统一筹划，全面布局，规范体例，严格按照有清一代的时间顺序加以纂辑。这是《全唐诗》的编纂逻辑，也是《全宋诗》以后每部断代性诗歌全集编纂的理路，没有必要改变这种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，另起炉灶。

一个现实问题是，《全清诗》实属海量，似无涯涘，一般看来，一个团队投入进去，如待全部编竣，工程巨大，藏事无期。对此可以采取“分段法”进行，即以顺、康、雍、乾、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这十朝，每朝自为一个段落，例称《全清诗·顺康卷》《全清诗·康熙卷》《全清诗·雍正卷》《全清诗·乾隆卷》《全清诗·嘉庆卷》《全清诗·道光卷》《全清诗·咸丰卷》《全清诗·同治卷》《全清诗·光绪卷》《全清诗·宣统卷》。这十朝，时间长短不等，其间诗人量固有等差，但未必太大（宣统卷可作特例处理^⑨）。即使有差别，因为是以时间为序，无非某朝卷册多些，某朝卷册少些，总体来说，并无大碍。顺其自然，反而客观上可以看出诗歌发展演变、诗学演进的起伏跌宕。

“分段法”的原则是，各卷自成起讫，相对独立，但卷与卷紧密连属，十卷形成一个完整的“全清诗”体系，合为一个总体格局。各卷内部，以诗人为单元，严格按照其出生时间或生活年代先后为序，生卒年失考者列于同时代作者之后。因每卷诗人和作品数量都极多，特以卷为单位编撰人名索引和文本索引，便于研究利用，也便于在《全清诗》编竣时，采取现代计算机技术，合成一个完整的检索系统。

“分段法”编纂的优势在于，符合文献编纂完整性、系统性、科学性的要求，可以有目的地开展，循序渐进，各卷起止明确，收录范围明确，能够大大降低卷与卷之间的复沓纠缠。这样，一卷便形成一朝诗史，可以客观、直接地反映当时诗歌发展的现状和演变，方便研究者利用。同时，这是一个需要大团队或多个团队长期合作进行的超大工程，实施“分段法”研究，可以确定团队分工、明晰学术责任。相信基于分段编纂的原则和方法，只要坚持不休不止，前后相续，则磊石成山，藏事可望。

四、《全清诗》编纂需开展的几项基础工作

《全清诗》编纂需要有一个总体学术规划，这是一个引导编纂者前行的路线图，不仅与如何开局相关，也是全部工作得以高质量顺利进行的保证。这方面既要遵体循例，也要考虑到《全清诗》编纂的某些特殊性。

（一）确定符合学术规范与编纂实际的收录范围

首先是收录诗人的时间断限。原则上《全清诗》起自顺治元年（1644），讫至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但有一批由明入清者和由清

入民国者，必须适当处理。钱谦益虽然生于万历十年(1582)，卒于康熙三年(1664)，生活于明代的时间远远超过入清之后，但其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，乃清初诗坛盟主，文学史家历来将其作为清代诗人，收录应无争议。冯舒如何处理？其生于万历二十一年(1593)，卒于顺治六年(1649)，入清方六年而已，但一般已将其视为胜朝遗民，且清初“二冯”并称，自也当同时收入。文学史上鼎革之际的文人归属问题，往往存在一个种“历史共认”，并不以入新朝时间长短来分辨。如元末明初陶安，其卒于洪武元年(1368)，即明朝立国当年即去世了，但以其归顺朱元璋政权较早，文学史上仍将他列入明初诗人群体，《全明诗》亦收录之。这种认知方法对处理很多晚明清初诗人，是值得借鉴的。至于下限，鉴于清末大量诗人进入民国，不但一批在晚清有科名、宦迹者当收入，即使没有科名、宦迹，在晚清曾参加诗社或有诗歌创作活动者，亦当收入。其人如有民国三十八年(1949)以后之作品，则概不阑入。

其次是收录诗歌类文体范围。《全清诗》收录诗作，例以古体、近体、杂体、民歌为限，文章(含日记)中有的明确标明为诗，自应收入。骚体、谚谣酌予收录。^[10] 颂、赞、铭，以不收为宜。清文量极大，如其中颂、赞、铭皆收，将使《全清诗》体量平添很多，且工作量也将极大增加。另外，联句是否收入？有清一代，文人所作寿联、挽联、谚联，以及园林、小筑、祠堂、庙宇、桥梁等处楹联，乃至书籍、绘画上的题联，在在皆是，数量极为庞大。这些联句“备具整齐律、参差律、次第律、抑扬律、反复律、当对律和重叠律；凡是中国诗篇底外形律，它无一不可以备具，所以但就外形而论，它实在可以说完全是诗的。至于它底内容，虽然一部分是教训式的格言和颂扬式的谀词等，但是大部是写景的和抒情的，和诗篇底内容一致；所以它总不出诗篇底范围，可以说是诗篇底一种”^{[19]4863}。一般来说，在断代性诗歌总集中收入联句有文体学的正当性，但鉴于清代诗歌海量的规模，可在“全力构筑主体，适当切割边缘”的原则下，对联句基本不收，留待编纂专门性的《清代联句全书》。当然，如清人诗歌别集中已经收入，则应保持古籍原貌，不必特意割舍。

(二) 进一步积累清诗版本目录学研究成果

清诗版本目录学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为开展《全清诗》编纂打下了良好基础。但问题仍然存在，且亟待修正。举例来说，董正国(1658—1729)为清初宁波地区著名诗人，全祖望编《续甬上耆旧诗》卷一二五中选有董氏诗21首。他生平著述最秘，不肯轻以示人。《(乾隆)鄞县志》有董正国小传，却未著录其诗文集。柯愈春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著录董氏《南墩诗稿》一卷，称“此为稿本，与佚名著《绿江初草》合为一册”^{[20]395}，并不准确。《南墩诗稿》清代未曾现世，但有孤本(稿本)存于民间，其版心书“南墩先生诗原稿抄”。2010年5月，该书出现于拍卖会上，为人所购，傅璇琮先生得阅后著文介绍，方为世人所知。从该稿本来看，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谓董正国所著另有《弃余草》《越游草》，“今未见传本”，亦显误。傅先生考订认为：“《弃余草》确未见传本，但《越游草》实见于《南墩诗稿》。”^[21]这类情况盖不在少数，要不断积累专题探讨成果，对清诗文献的真实情况有准确认知。

这方面更需考虑的是如何广泛深入调查、研究，编制出基本完备的《〈全清诗〉总目》。《清人别集总目》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等目录学著作，皆诗文合一，将其中清人诗集别取出来，加以序化编目并不难。问题是，这些只是《全清诗》的一个部分，还有不少清诗文献需要通过研究，加以发覆。另外，相信至今民间尚藏有部分稿本，特别晚清人的诗歌作品，不少为作者后人收藏；一部分清代民歌集，也在民间流传，都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征集。志存博采，网罗放逸，当能有所收获。

(三) 适时编纂《清代十朝诗人谱录》

这里“十朝诗”之名取之于近代郭则沅的《十朝诗乘》。松村昂教授曾根据131种清诗总集整理出42200家清诗作者，江庆柏先生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载录约25000家清人生卒年，钱仲联先生主编的《清诗纪事》进一步丰富了清代诗人生平史料。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清代卷》收诗人3124人，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近代卷》约收950人，也就是说约有4000多位作家已经形成了《小传》。这些都为编制《清代十朝诗人谱录》奠定了基础，使《全清诗》编纂工作具备了一定的条件。

但这方面工作量仍然巨大，目前已知的清代诗人或不足其半，尚有半数以上的诗人需要考证。相对来说，时代越近生平史料保存越多，如近代晚晴簃诗社徐世昌、樊增祥、王树枏、易顺鼎、周树谟、柯劭忞、郭曾炘、秦树声、徐树铮、曹秉章、吴传绮、张元奇、王式通、宋伯鲁、陈田、董康、郭则沅等四十一人，皆一时之选，其生平履历基本清楚。向前推之，道光十六（1836）年宣南诗社举行大规模的诗会活动，姚燮《复庄诗问》卷十有《徐编修师及叶绍本、黄爵滋两鸿胪，黄编修式琮，汪喜孙、陈庆镛两户部，招同人四十二人江亭展楔赋诗，得五言二章》纪事，因参与者（实际四十八名）大部分皆为朝廷馆阁中人，“凡是六主，各延七宾”^[22]《江亭展楔序》，420并不难考实。但如前所举唐金鉴辑《罗汉洞唱和诗册》，列名唱和者 126 家，绝大部分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诗人，需要发掘地方文献史料，由此及彼，细心探究，才能知其大略。《清代十朝诗人谱录》编纂的难点在未见科名，亦无仕历的不知名的中小作家，未来的突破和贡献亦在此。

在清诗版本目录学研究和《清代十朝诗人谱录》编制基础上，可以形成《清代分省诗歌总集索引》《清代分省诗歌别集索引》《清代分省诗人人名索引》《清诗馆藏分馆目录》，当极便于工作，同时可以防止遗漏和重复。在现今与未来数据库设计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，这样的学术兼技术问题比较容易解决。

五、结语

《全清诗》编纂，是一个重大学术工程，它将使中国历代诗歌全集合璧无缺，使中国诗歌史宝库得到极大的丰富。《全清诗》作为古代断代性诗歌文本的最大规模的集成，对表征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，对增进国家诗文化软实力，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建设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。此事学界关注已久，堪称世纪期待，但迄今为止仍然处于“望道却步”的状态。这是一个功在当下、利在千秋的学术事业，或迟或早必定要进行，不会一直搁置不问。三十年来，既已错过了 1992 年国家“七全一海”（《全唐五代诗》《全宋诗》《全宋文》《全元戏曲》《全元文》《全明诗》《全明文》《清文海》）立项的机会，错过了 21 世纪初的《清史工程》开展的机会，那么，能否列入新的规划，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行动呢？笔者撰写此文，聊为献芹，于此宏伟事业并申希冀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商务印书馆．征求诗文集启[J]．东方杂志,1908,(10)．
- [2]胡玉缙．许颀学林[M]．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,1958．
- [3]胡怀琛．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[J]．南社,1916,(16)．
- [4]朱则杰．《全清诗》的先声[J]．中国文学研究,2012,(4)．
- [5]黄山民．徐世昌之秘密[M]．上海:新学印书局,1922．
- [6]汪中．民国史料[J]．国讯,1936,(128)．
- [7]潘静如．《晚晴簃诗汇》的编纂成员、续补与别纂考论[J]．中国典籍与文化,2016,(2)
- [8]郭绍虞．从悼念到建议[J]．文学遗产,1980,(1)．
- [9]钱仲联．钱仲联自传[M]．成都:巴蜀书社,1993．

-
- [10]严迪昌. 清诗史[M]. 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1]罗时进. 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[N]. 中国社会科学报. 2013-08-16.
- [12]赵宝靖, 冷卫国. 编纂《全清诗》的一种可能性思路[J]. 学术交流, 2015, (3).
- [13]杨牧之. 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[M]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8.
- [14]何曰愈. 退庵诗话[M]. 清光绪香山何氏刻本.
- [15]黄爱平.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1989.
- [16]朱则杰. 《全清诗》探索与清诗综合研究[M]. 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20.
- [17]高旭. 高旭集[M]. 郭长海, 金菊贞, 编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3.
- [18]胡玉缙. 许廌学林[M]. 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, 1958.
- [19]刘大白. 白屋联话[M] 龚联寿, 主编. 联话丛编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20]柯愈春.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[M]. 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 2001.
- [21]傅璇琮. 清董正国《南墩诗稿》[J]. 中华文史论丛, 2011, (4).
- [22]梅曾亮. 柏枧山房诗文集[M]. 彭国忠, 胡晓明, 点校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

注释:

1 根据潘静如研究, “1929 至 1931 年间, 《诗汇》屡经抽改、增补、校阅、排刻, 全套定本的刊成似乎不会早于 1931 年秋。1988 年, 中国书店据印的只能是 1931 年刻本, 绝非《影印说明》所谓的‘退耕堂民国十七年雕版’”。见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8 年第 3 期。

2 以上论文, 除《〈全清诗〉的先声》(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12 年第 3 期)外, 均收入朱则杰等《〈全清诗〉探索与清诗综合研究》,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, 可参读。

3 这类例证参见朱则杰《清诗考证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)、《清诗考证续编》(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)“结社集会”类, 罗时进《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》(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, 2013 年 8 月 16 日)。

4 这方面的成果参读罗时进《明清江南市镇及其文学群落的形成——以空间分布、流动汇聚、环境生态为视角》, 载《社会科学》2017 年第 8 期; 罗时进《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考论》, 载《江淮论坛》2020 年第 3 期; 王文荣《清代江南市镇的地方诗总集探论》, 载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21 年第 1 期。

5 说见朱则杰《清诗总集研究的硕果——读〈清诗总集 131 种解题〉》, 载《清诗知识》,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, 第 241

页。参见朱则杰《〈全清诗〉探索与清诗综合研究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，第 7 页及第 11 页。

6 《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》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出版。此书虽称“历代”，实以明清为主，尤以清代诗文数量最多。

7 按：有助于《全清诗》编纂的目录学研究著作很多，综合性的如袁行云编著的《清人诗集叙录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）等；地方性的有关清代目录学的著作更多，如王晓波等主编的《清代蜀人著述总目》（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）等；专题性的如谢正光编著的《明遗民传记索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）等；海外著作除松村昂编著的《清诗总集 131 种解题》（大阪经济大学中国文艺研究会 1989 年版）外，尚有西村元照编著的《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》（1979 年油印本）等，不一一俱列。

8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，参见罗时进《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》（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，2013 年 8 月 16 日）。

9 同、光、宣年间诗人跨及民初，人数相当多。如何平衡这几卷，尤其如何适当编纂《宣统卷》，是个特殊问题。可作适当调整，以臻周备。

10 骚体作品，或为诗，或为文，难以一概而论；即使题目中标明为“赋”，也未必即文，需具体分析裁定。谚谣，全部收录固然有理，但其数量极多，蒐辑编纂工作量极大，亦当根据用韵情况和文学色彩酌定，宜从严把握。